



斯大林前后

〔芬兰〕艾诺·库西宁著
张 化译
杨照明校

群 众 出 版 社

斯大林前后

(芬兰) 艾诺·库西宁

张化译

杨照明校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斯大林前后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3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60元

出版说明

作者艾诺·库西宁，是苏联籍芬兰人，是芬兰共产党创建人奥托·库西宁的夫人。二十年代，他们夫妇均在共产国际工作。奥托·库西宁于一九四一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直至一九六四年逝世。作者艾诺·库西宁先在共产国际莫斯科总部工作，后来被派往美国和日本，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局工作。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回莫斯科，一九三八和一九四六年两次被捕，先后被监禁、流放达十五年之久，于一九五五年获释。出狱后几经周折，直至一九六五年才获准去芬兰旅行，后定居芬兰，于一九七〇年逝世。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使她得以亲身经历了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内部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斯大林前后》是作者的回忆录，在叙述她漫长、艰辛、多变的经历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党、政府的历史事实，提供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一些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然，对作者的某些观点，例如，全盘否定第三国际和整个苏维埃制度，认为苏联肃反扩大化是制度造成的等，正确与否有不同意见，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回忆录中的内容也并非全部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的显系来自传闻，对此也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三月

前 言

一九六六年初，许多欧洲报纸宣称：担任共产国际书记职务多年的苏联高级官员奥托·库西宁〔1〕的遗孀艾诺·库西宁到西方来了（艾诺·库西宁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达芬兰，但到第二年才向报界宣布此事——原注）。据报道，苏联政府只批准艾诺·库西宁对她的故土芬兰作短暂的访问，但她决定再也不回苏联了。

很自然，由于艾诺·库西宁自己只是奥托·库西宁的遗孀，这件事起先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奥托是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是列宁的朋友，是斯大林的顾问，也是赫鲁晓夫的亲密同事。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中起过重要作用，结果使他大名远扬，远远超出了共产主义世界。库西宁是一九一八年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九年，他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因此在共产主义世界组织的领导层中，他几乎是自始至终的领导人。库西宁虽然是个芬兰人，但他活跃在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中。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七年，他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副主席；从一九四一年到死他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到了晚年，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他甚至还是党的主席团（政治局）——苏联的最高权力中心——委员。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奥托·库西宁去世，苏联为他举行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国葬。几个月后，艾

诺·库西宁被批准出国，这使她得以永远离开了苏联。这样一个苏联高级政治家的妻子到西方来，这还是第一次——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是一年以后才这样做的。这件事本身如此不一般，这就足够激起人们对艾诺·库西宁的兴趣了。

但当她同西方报界接触以后——其中有与斯德哥尔摩《快报》的会见，有与意大利《欧洲报》一次内容广泛的会见——很明显，人们不再仅仅把她看成是奥托·库西宁的附属物。她在会见中清楚地显现出：她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生活情节并具有自己见解和目的、个性很强的人物。

我的有关艾诺·库西宁的第一批报道，首先是在采访了她的详情的基础上写出的，并引起了一种进一步了解她本人的热烈兴趣和愿望。我的愿望很快就得到了满足，比我所希望的要快。一九六六年六月初，也就是第一批报道后的几个月，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告诉我她打算写回忆录，并请求能帮助她。

她是在阅读了我在芬兰所写的《Die Revolution entlaesst ihre Kinder》（《革命的孩子》英译本）一书，并从中知道我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曾在苏联以后写信给我的。当时，她也在苏联。她还知道我在芬兰从事苏联事务和共产国际问题的研究，她认为我是能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她和她的命运的人，是能够帮助她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一次简短的通讯后，我们安排了第一次会见。艾诺·库西宁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她是个具有可爱性格的老妇人，惊人的聪明，理解力非常敏锐。她说好几种语言，包括地道的德语。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她对人和事情的牢固记忆和生动

而形象地叙述个人经历的本领，以及常常以辛辣的讽刺表达出的幽默感。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七十多岁了，但她仍然精神焕发，轻松愉快，生气勃勃，甚至还有点卖俏。她一心想写自己的回忆录。象她这样年纪的妇女能有如此的意志力是非常难得的。当她回忆二十年代开始从事共产国际的活动、赴美的特别使命、参与苏联在日本的间谍机构的活动、她的被捕和在苏联集中营里的生活，以及一九五五年她获释以后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几年的生活时，侃侃而谈，口若悬河。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提出了将她有趣的戏剧性的生活故事进行录音及一些其他的建议，她都欣然接受了。我们达成协议，她所完成的手稿部分由我发行，安排在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出版她的回忆录。差不多在过了一年的时间里，我收到了她回忆录手稿的大部分。我发现这是一份发人深省和很吸引人的材料。

我感到回忆录应尽快发表。世界一致公认，虽然现在正积极活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苏联的人们出版了数十本回忆录，但都被斯大林主义玷污了。以我之见，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在迄今出版的这些书中是与众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回忆录大多数都只包括苏联或共产主义发展的有限的几个阶段，几乎没有一本是叙述很多年或几十年历史的。但艾诺·库西宁的经历则包括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六五年，即从列宁时代起直到赫鲁晓夫倒台止这样一段历史。尤其是在这四十年中，她在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历了天壤之别的两种生活，难以预测的命运把她从令人目眩的高处一下子抛到最底层，使她由权贵沦为囚犯。

她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新颖的、不一般的和与众不同的。她的观点既不是作为一个在苏联国内成长起来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那种观点，也不是由于对社会不公正和政治压迫感到愤懑，或受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影响而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西欧知识分子的那种观点。艾诺·库西宁并不是通过官僚系统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其感情和态度恰恰与这种“官员”的类型相反；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问题确实并没成为她生活的重要部分。她的回忆录勿宁说是一个美丽的、聪明的、有教养的和非常自信的妇女的回忆录。而她之所以参加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参加苏联情报机构的活动，是由于一系列很不寻常的情况，甚至可以说是意外事件而促成的。从她对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包括某些不平凡的使命的活生生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常常在阅读了她的回忆录后——从一九一八年她爱上奥托·库西宁而离开自己在芬兰的家开始——得到这样的印象：冒险、犯难可能是她生活中的主要动机。

从艾诺·库西宁的经历中清楚地浮现出一件事，这就是：尽管在共产国际活动多年，但当在对任何形势作出反应时，她首先想到的总是自己是一个芬兰人。苏联官方认为已经解决的民族问题很少遭到如此明确的反对，尽管艾诺·库西宁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政治态度。虽然一点也不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可她却间接地、如此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实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矛盾现象。

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完全是个人自叙，尤其是关于她在苏联监狱和集中营生活的那部分。和其他罪犯对比，她从

把苏联当局看成无论如何也是正确的这种危险中逃了出来；她从把他们看作是仅仅采取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的“同志”的这种危险中逃了出来。我相信，就她而言，这并不是出于基本的敌意，无非是出于一个出身名门的妇女的自然权威和充分的自信。她在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很多国家中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她的勇气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根源。她和丈夫珍妮·琴兹伯格或娜德志达·曼德尔斯坦相反，前者是一个比她的折磨者要好的共产党员，后者除了痛苦和死亡外对斯大林统治不抱任何希望。艾诺·库西宁面对自己处境的严酷现实，没有什么灵魂上的忏悔，没有悲观失望，没让自己的整个内心世界崩溃；她决心生存下来，是由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她那战胜要搞垮她和弄死她的苏联当局的信心。

她的回忆录的个人性质以及常有的感情冲动不免有所夸张，尤其对她丈夫奥托·库西宁的态度就更明显。事实上，她暗中赞扬他，也从来把他与统治者联在一起；她对他的不时批评，与其说是对事实的一个客观判断，不如说是她个人痛苦经历的结果。奥托·库西宁冤枉了她，于是她再也不爱他，而且不愿再看到他。虽然库西宁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中无可怀疑地起了重要作用，但看来艾诺的个人观点常常引导她把他所起的作用描述得比他在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更重要。

艾诺·库西宁并不自称自己的生活经历具有历史分析的意义；首先强调的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意志坚强、思想活跃和情绪热烈的妇女的个人经历。她描绘了她所经历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从我们的谈话中，我能证实作者所关切的就是使她自己的经历尽量客观真实。然

而很清楚，这些都带上了她的经历，特别是在集中营那段经历的感情色彩。此外，当艾诺·库西宁开始写其回忆录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要不是她那惊人的活力和好记性，想回想几十年前的往事，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有这样的印象：她写回忆录是她生活的最后目标。这件工作越是接近结束，她好象感到自己的生命也越随之结束，她最初的乐观主义也开始衰退了。在一九六六年，她还充满生气随时准备接受采访，而现在则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了。她逐渐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高度的乐观主义情绪已被悲观和沮丧所取代。当她的回忆录写完时，她要求我等到她死后再发表。当她在一九六七年秋天给我写信时，她已经做完了她的毕生工作。但鉴于自己的岁数和身体不佳，她希望免去往往在出版一本书时所带来的激动情绪以及要会见报界等一些麻烦。因此，她把手稿委托给我等她死后出版，并希望要我公正地、诚实地和谅解地对待和处理它。

遵照她的请求，这份回忆录一直在我的抽屉里锁了将近三年。我很自然地了解她的希望，所以不得不把她的回忆录与世隔绝。这很遗憾。

艾诺·库西宁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去世，履行我们之间在一九六六年所作的协定，并完成其最后夙愿的时候终于到了。作为回忆录的编辑，我的主要任务是核对历史事实和人名以及在必要的地方加以注释。除了很小的文体变动和不重要的删节外，本书确切地保存了艾诺·库西宁的原稿。作为编辑，我不必把她对事情和人物所作的详尽描述作为历史的根本真相来接受，我也不用她的政治观点和判断来联系自己。

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对我如此重要，以至我为此曾向许多朋友和熟识的人当中的一些专家请教。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的不仅有在过去几个月中曾经仔细阅读过这份手稿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帮助我进行编辑的人。现住在慕尼黑著名的苏联事务问题专家鲍利斯·纽维茨基，他主要致力于艾诺·库西宁生活在苏联期间的那一部分，校对了很多历史数据，并帮我收集编写了人物注释；叙拉库斯大学的约翰·霍奇森教授，是公认的芬兰共产主义问题的头号专家，曾写过几本专著。他的《芬兰的共产主义》一书，提供了有关奥托·库西宁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他正在撰写奥托的传记。他还提供了在本书中所提到的其他芬兰共产主义者的资料；罗斯·冯·马冈堡（其自传由伯劳斯·伯纳特和罗特·法宁在一九六九年于维也纳发表）、巴毕特·格劳斯（维利·明森堡传记的作者和终身伙伴）他俩在不同的时间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有过联系，他们也帮助校对了这本回忆录的有关章节并作了校正。

我之所以编辑这些回忆录，不仅仅是由于我和艾诺·库西宁的个人友谊和为了实现其最终愿望，而是因为我以为她的经历是我们时代的一份戏剧性文件；它超出了个人结构并提供了国际共产主义及关于苏联的发展了的新见识。历史学家们将毫无疑问地处处提出异议，但我希望，至少同意我把艾诺·库西宁的生活经历——尽管有嫌琐碎，看作当前历史的一份重要文献，以把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完全不被人们知晓的人物、境遇和事件带到光天化日之下。

对于那些一般能较快地读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反映了当代事件的个人经历和遭遇——不是枯燥的编年史似的记叙

——的人来说，艾诺·库西宁的回忆录是拥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它是一个目击者的叙述。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一九七一年秋

目 录

前言.....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一 命运之环.....	(1)
二 共产国际.....	(22)
三 我去美国的使命.....	(74)
四 日本——微笑之乡.....	(97)
五 在莫斯科监狱.....	(124)
六 沃尔库塔的八年.....	(147)
七 苏维埃自由.....	(181)
八 葡萄玛的五年半.....	(199)
九 我的最后释放及去芬兰.....	(211)

一 命运之环

我已故的丈夫奥托·W·库西宁曾是蜚声国际的共产党人中最令人神往的人物之一。我希望，我对于个人亲身经历的记载，能对这位神秘的人物投以光辉，现其原形。

奥托·库西宁在苏联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他人生哲学的论文，题目是《选择正确之环》^①。考虑到布尔什维克醉心于大机器，在书中他为读者想象出一台装有传送皮带的设备，皮带上挂有能够被站在下面的人抓住的很多环。他说，在一生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抓住一个环并挂上去，但不知这根传送带将把他带到哪儿。幸福的生活就在于你能抓住正确的环，它将把人载越生活的深渊；这样，当人放开它时，肯定能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有很多人命运不佳，抓错了环，因而就落在了一个危险的地方，距离他们希望的那些地方很远很远。其他人好不容易抓住了正确的环，但松手太快了，落在了错误的地方。库西宁的这个比喻并不是人类状况不好的说明。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二十年代初我开始抓住了一个环，它把我带出了芬兰。首先到莫斯科，然后又到地球的许多地方——这是些我从来未想到的地方。在莫斯科——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七年之后，我丈夫奥托·库西宁和我选择了不

①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真理报》第二版，奥·W·库西宁：《正确的环》。

同的环，我离开苏俄，花了两年工夫去美国执行秘密使命。

我在纽约生活一段时期回到苏联后，首都干巴巴的平俗生活令人难以忍受。我换了一个环，它把我载到战前的日本，在苏联秘密机关的帮助下，我在那儿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和最无忧无虑的一段生活。我的工作使我和一个男人联系，他在死后多年仍一直被称作苏联最优秀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博士〔2〕。然而，在三十年代中期，当我首次在莫斯科见他时，他尚未获得这样高的称颂。

一九三七年底，我奉召返回莫斯科。我服从是因为我想我回去并没有坏处。但这一次我却选择错了环，和许许多多一样，我要和斯大林大清洗的恐怖朝夕相处了。在莫斯科监狱里，我被审讯了一年多；接着在北极圈中臭名昭著的沃尔库塔集中营度过了漫长的八年。不用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岁月。幸亏我这强健的身体，可能还幸亏有看不见的保护者，还有足智多谋以及芬兰人所称道的“sisu”（勇气和不屈不挠），我总算熬过了这些折磨。

战后，我从沃尔库塔获释了，我立即发现我自己所面临的是所有其他苏联政治犯面临过的困境。当局不允许我住在莫斯科，只好在高加索找到了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和朋友们和睦相处。但是阳光和宁静并不是我的，我再次被捕，投进了我已经熟悉了的一个监狱。尽管此时我的体质已在恶化，最后还是被送到了葡萄玛劳动集中营，在那儿，我度过了五年半。一九五五年，斯大林死后两年，我才最终被释放。

我作为苏联的政治犯，度过了自己一生中十五年的时光。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决心要写作和出版我的回忆录，因为看来这是我报复那些非法剥夺我人生自由的人的唯一方

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十五年当中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活下来，并确保我能身心健康、斗志旺盛地走出集中营。可能有人要问我，写这样一篇回忆录为什么那样重要，许多关于切身经历了苏联监狱恐怖生活的珍贵传记不是已有出版了吗？但是我坚信，诸如此类每一个人的经历，都能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协助世界看清苏联的政权统治。

一九五九年，我重获自由的那天，我就对自己发誓：我豁出来了，一定要摆脱践踏我做人权力的“工人的天堂”。在我达到这一目的之前，已经过去了十年。最后，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几乎是在奥托·库西宁死后一年，我才被允许访问我的故乡芬兰。

我已经冒了不少的风险，与我同时代的人们相比，我更为经常地受到命运的嘲弄。但我并没有被我的辛酸的经历所压垮，也没有失去生活的乐趣。至少我明白了一件事：每个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主宰自己的命运。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其他人为我们带来了那些辛酸的经历；同样地，要是我们抓住了正确的环，那就会为我们带来幸福。

我出生在上世纪末，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我童年的大部分是在芬兰中部度过的，和我们的三个兄弟一样，我是在那儿长大的。当我们还小的时候^①，父母就教育我们对人生

① 根据苏联档案材料记载，艾诺·库西宁的出生日期为一八九三年三月五日，这与约翰·H·霍奇森教授指出的一样；而一些芬兰材料指出其生日为一八八六年三月五日，这个日期大概是准确的，因为这才与她在第一章中叙述的早期生活以及她与萨罗拉的结婚日期相吻合。大概是苏联当局决定把她在为共产国际工作的这段时间说得年轻七岁——这是出于掩护而经常采用的手法。

保持无畏和淡薄的重要性。虽然我不记得曾经受过处罚，但肯定没有受到溺爱。在很小的时候，我就顽强、大胆，以至敢和任何一个男孩滑冰、游泳。

当我还不足十岁时，我就怀着这样一个理想：作为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到非洲去。这个抱负是由一位到我们地区旅行的传教士激起的，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这样他可以给非洲的穷孩子买衣服。当父亲听说后，他劝我别浪费钱，因为非洲特别热，那儿的小孩都不穿衣裤。现在我还常常希望，我的所有的突然决定应该象这样不致产生什么有害的结果。但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的很多外国的政治历史知识都应归功于我父亲。从我们的幼小童年开始，他在给我们讲述这些知识时，使用了很吸引人的方法。当我年轻的时候，芬兰仍然属于沙皇俄国，它正试图谋划一项庞大的俄罗斯化纲领。我们的父亲尽力要我们懂得威胁芬兰大公爵领地的危险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原先授予的宪法权力是怎样在受到侵犯。父亲除了他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外，还和我们共享其他许多爱好；他还拥有一所藏书很多的图书馆，通过它，我们可以博览群书。从他那里我可能继承了对戏剧的爱好。禁酒是他主要关心的一个运动，在我们那一带，他建立了一个禁酒协会，由他担任主席，在会上他常常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他再三地使我们牢记，孩子们最重要的是戒酒。

在学校里，我进步很快，尤其突出的是外语和写短评。我的短评常常被老师当堂朗读，作为优秀文风的范文。高中毕业后，我在赫尔辛基的外科医院学习了四年制的护士课程。我总是以万分感激和尊敬的心情回忆起那里的医生；其